

比

较

智量主编

比较文学三百篇

BI JIAO WEN XUE SHAN BAI PI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

学

70-03/1

76551

比较文学三百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文学 ★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比较文学三百篇

智 量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插页 5 字数 1,227,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0215-7/I·168 定价：14.20元

主 编：智 量

副主编：金子信

谢天振

夏中义

戴 诩

朱宪生

编 委：熊玉鹏

许光华

邓乔彬

王圣思

序

比较文学：从西方到中国

——代序

智 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类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世界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接触更为频繁，相互之间求得了解的意愿也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强烈。这种紧密联系的事实和要求，促使了许多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中的边缘、交叉、关联学科的出现。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上世纪中叶的诞生，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早在千百年前，与当今“比较文学”概念相符合的文学比较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司马迁在公元前所著的《史记》中已经把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安息国（今伊朗）的“传闻”进行过比较。古代罗马人也曾不止一次拿他们的文学与希腊文学作比较。后来的十几个世纪中，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有过这种性质的文学研究，比如中国对佛教故事与中国神话传说的比较，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诗歌主题的流传研究等皆是。只是，作为一门以研究文学的国际联系为任务的单独的学科，是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随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而有意识地形成的。于是，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阶段正式开始了。

欧洲学者，其中主要是法国学者，为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它在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在将近一个世纪中，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成果，为比较文学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这种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学关系的专门研究领域，是在人类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后这种联系的紧密化的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上出现的，因此，在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西方人的研究主要均着眼于“联系”。欧洲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其强调事实的联系，其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均与这“联系”二字相关。法国学者们是脚踏实地的，他们以求证联系为自己做学问的核心，他们以描述、纪录各国文学之间的

实际联系，调查、追索这些联系，注解、阐释这些联系，判断、确定这些联系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法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的主要理论家基亚也一再宣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 的相互联系”，“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法国学者从联系出发，研究文学题材与主题的发生、壮大、消失和命运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传播、模仿和影响，研究类型和传说，以及作为传播媒介的翻译和译者等等。他们一丝不苟，不说大话，不带幻想，不相信偶然。许多学识渊博的专家终生孜孜不倦地、谦虚认真地核对、整理、分析、归纳欧洲文学史上的种种有关文学联系的事实和材料。法国学者在工作中表现的这种基本特点，使他们为西方和全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法国比较文学家都是文学史家。对于他们来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只是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扩大和延伸，他们说，“比较文学只是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以及它们之上，编织出一个更为普遍的文学史的网来”（梵·第根）。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基亚）这句话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的概括。比较文学在他们实际只寻找两种文学史之间的影响联系，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对比的概念。

在作为“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影响研究中，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 第一流学者梵·第根提出过一个重要论点，他说：“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让出一个地位给本国文学史所只稍稍提到或竟不提到的那些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作家。”他认为，“比较文学的价值表是和各本国文学史的价值表绝对不相同的。”梵·第根在这里提醒我们注意到文学历史及其影响流传的复杂性。伟大作家是本民族文学的代表，也当然是人类文学的杰出贡献者，但是，文学史不能只是一些伟大作家的历史，一般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决不能只看见伟大作家而忽视许多不那么伟大的作家，不应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有意识地丢开一些对人类作出过贡献的人。并且，作家与作品的价值的表现方式和被接受的情况与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影响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也是一个有待于用大量材料来证明和探讨的问题。如果只限于对伟大作家影响的探讨而忽略其他作家作品所客观产生的影响，将不利于世界文学客观规律性的揭示。梵·第根的这一观点是法国比较文学家通过他们大量的实际调查所作出的，它是西方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一个贡献，不可轻易否定。后来美国比较文学界对他的这一观点的轻视态度是并无道理的。

总之，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这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的工作是有特色的，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美国比较文学家雷马克公正地说过：“比较文学中大部分，也许绝大部分比较研究的重大成果，要归功于法国人以及他们所培养的学者。”

然而，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毕竟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初期阶段，它必然会有缺点与不足，法国学者是第一阶段的主要作出贡献者，同时他们也表现了这一阶段工作中的主要缺点。而这些贡献与缺点，如前所述，都和他们对于比较文学任务的理解密不可分。

这些早期的法国学者由于紧扣事实的联系而谨小慎微，他们“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过于务“实”而目光欠远大。比如，他们的代表性理论家伽列说：“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他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事实联系。它不是探讨作品原有的价值，而是着重关心一些国家和作家如何改造他们借用来的东西。……象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这样的大略的平行关系……因为系统性过强、时空延展太开而有化成为抽象空泛、主观臆断的东西、只剩下些标签的危险。尽管比较文学能够领出一条通向这些综合的路来，它本身并不能完成这些综合”。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法国学者多么地小心谨慎，他生怕自己研究的学问越出“事实联系”的雷池一步，再三申明不去触及有关作品的价值，有关文艺时代、思潮等等涉及理论、判断的“系统性过强、时空延展太开”的东西。他害怕探求高一层次的规律，害怕综合。他只顾勤恳地寻找事实，以不犯错误，不冒危险为目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学问应该为人类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概括性意义的结论。如果说这是一种“只顾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治学方法，也许不算夸张。第一阶段的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还由于目光短浅，谨小慎微，而缺乏远见和想象力。因此不能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并发展出事实联系以上的东西来。

还应该提出的是，第一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几乎完全是由欧洲大陆的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进行的。地域的限制和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阶段、以及一般科学与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使这些学者往往只从欧洲范围来看文学的联系。他们所进行的文学渊源、影响的事实研究，往往只限于欧洲国家之间，虽偶尔也涉及欧洲文学与美洲或亚洲文学的联系，也主要是寻求欧洲文学对外的影响。世界之大，决非一个欧洲所能替代，仅仅研究欧洲文学间的比较（更何况只是看见具体的影响与事实的关系），不可能寻找出世界范围的文学规律来。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和实践是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第一阶段的另一个重大的局限。同时，当法国学者在研究比较文学时，他们主要的注意力又是放在了与法国文学有关的文学联系上，这里有自然的原因，但是日久天长，限于一些研究家的自身条件，他们难免

表露出一種法國文學優於其他國家文學的情緒來，因而帶有了一種民族沙文主義的色彩，影響了結論的客觀性和可靠性。這也是第一階段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缺點。

發展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種唯事實主義、實證主義的狹隘研究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有一個飛躍，才能健康發展。於是，開始進入了西方比較文學研究史的第二個階段。

二

五十年代初期，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希與韋勒克等人已經在美國《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鑑》等刊物上提出了對法國學者上述缺點的不滿，一九五五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後的第一次大會在意大利威尼斯召開，美國學者即因其議題（“文學中的威尼斯”）的事實主義出發點和歐洲中心論氣息而不予響應。一九五八年的第二次大會以座談會形式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教堂山舉行，韋勒克提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論點，對近百年來以歐洲學者為主的比較文學研究的缺點提出尖銳的批評，從此開始了西方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二個歷史階段。與將近百年的第一階段相比，第二階段的歷史是短的。然而急速發展、突飛猛進，正是本世紀以來人類文明與知識的各個方面的共同特徵，美國學者在當時為西方比較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美國學者視野比較廣闊，注意到全世界文學的整體性和文學的內部規律性，從而擺脫了事實主義的約束，並能從國際範圍着眼。韋勒克說：“比較文學是從國際的角度來研究一切文學”。也正是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對前一階段法國學者的研究提出了三點批評：（1）內容和方法的人為的界線；（2）淵源和影響的機械主義聯繫；（3）文化民族主義的動機。他嚴厲地指出，過去工作中這些由於視野狹隘而造成的缺點已經嚴重地影響了比較文學的發展，形成了“危機”。他反對把“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分開，把文學的外部聯繫與文學本身的特点分開，把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分開，認為這都是人為的割裂；他反對只從淵源和影響的因果角度去考察文學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而不去探討含有整體意義的更高層次的文學規律；反對法國人只看見法國和歐洲，而忽略了自身以外的全世界的文學。這些批評在當時都是針對時弊，一語中的的。

美國學者的主張中最有特徵的一點，是提出了平行對比的研究方法，他們強調指出除了具有直接事實聯繫的影響與流傳來源的研究之外，比較文學必須研究並無影響關係可言的、完全不属于同一時空條件下的文學現象之間的異同。並從中尋找文學的根本規律，認為這種平行研究的方法比只看事實關係的研究更符合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要求。許多美國學者對於他

们所主张的平行研究从不同角度做了清晰的陈述。平行研究的强调提出，大大扩展了比较文学的领域，提高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使它名副其实，而不再如过来那样，仅仅是一种寻求事实联系的资料性的工作，而成为一门真正运用“比较”方法探索文学规律的学术工作。这是美国学者的贡献。这种比较文学的新观念引导人们突破旧学派的实证主义框框，摆脱局部的事实联系的羁绊，获得一种高一级的立足点。不仅如此，美国学者还从更大范围的整体观点出发，不只是提倡文学内部的平行研究，而且进一步提倡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领域的比较，从而大大扩展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并使这一学科进入了对人类认识的综合性与高层次探讨的领域。雷马克在这方面的观点可为代表，他说：“比较文学包括一种文学与另一种或几种文学的比较，以及文学与人类表达方式的所有其他领域的比较”。他提出：“要是我们有志于加入世界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应该时时把文学研究中获得的见解和成果汇集起来，并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其他学科、整个民族和整个世界。”这样，比较文学研究便更上一层楼，成为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方面，并且也使其自身成为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了。

美国学者把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能从整体观念出发，扩大视野，纵观全局，富有开拓精神和时代精神，而且因为他们把这种整体观贯彻到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上。不仅注意到文学的外部联系，流传和影响，而且注意到文学的内部联系，注意到文学的美学涵义和文学评论的美学原则，把比较文学的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轨道上，从而使这门学科摆脱了欧洲学者后来逐渐表现的只顾追索事实而忽视文学特征的倾向。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重视文学性，认为这是文艺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他在批评法国学者只顾机械地寻找来源和影响时指出：“文学研究界今天首先应当认识到确定研究内容和中心的必要性。应当把文学研究同思想史的研究、同宗教及政治观念和情绪的研究区分开来，而这些研究往往被建议用来替代文学研究。很多在古代研究方面、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真正的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衷于研究公众舆论史……等等。文学研究这个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竟与整个人类史相同起来了。”韦勒克从现代结构主义观点出发，要求从文学内部结构的特点上认真对待一切作为“符号和意义的分层结构”。我们固然未必同意他的这种理论基础，然而对于他和他的美国同行所提出的比较文学研究是文学的研究，反对象法国学者那样“摆脱美学涵义”去排列事实这一观点，我们当然是同意的，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进展。

美国学者强调指出即使是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也必须是文学的影响

研究，影响过程中必然会介入接受影响者的形象思维的创造，不可能有什么单纯的脱离文学整体的因果联系，韦勒克说，“通过自由想象孕育而成的艺术是一个整体，如果把它割裂成渊源和影响，它的完整性和含义就要被破坏了。”“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这“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即指接受者对影响的艺术的消化和改造，他说：“在文学上，这种因果解释（指某一因素从原因到结果的直接的无变化的联系）几乎不能完全成功地确立任何因果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一部作品可完全归因于外国的影响。”美国学者从文学的整体观和特殊性出发，对法国学者的影响研究作出的这一点补正，对于比较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韦勒克在他的《危机》一文中对欧洲学者的第三点批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动机”）也是击中要害的。他指出，“法、德、意等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本爱国主义动机，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予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方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他批评基亚给学生出的比较文学题目尽是些“龙沙在西班牙”、“高乃依在意大利”、“帕斯克在荷兰”之类，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扩张主义”。比较文学研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异同及其规律性，如果研究者眼界不大，受其乡土感情的支配，带有这类狭隘的沙文主义情绪，势必影响他在作理论上的归纳与结论时表现偏颇，不能客观地概括事实，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由于美国本身文化构成的特点与历史条件，或许也由于美国人性一般比较开朗，美国比较文学工作者的确较少表现出这种从本国出发的情绪。

在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中，是美国学者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如上所述，美国学派有许多优点。然而美国学派的缺点也恰恰与他们的这些优点相联系而出现。

美国学派为第二阶段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所带来的主要缺点，是使比较文学的范围、任务、目的逐渐扩大开去，甚至发展到了使比较文学学科没有必要存在的地步。法国学者把比较文学搞得太窄狭了，把比较缩小为事实的联系，这样使得比较文学不象是比较文学，而美国学者则把它搞得太宽泛了，把一切都纳入了“比较文学”，结果又出现了使比较文学本身融解而消失的新危机。韦勒克一再宣称“就我个人说，我希望（比较文学）干脆就称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不可避免地合二为一。可能最好的办法是仅仅称之为‘文学’”。这个观点几乎是所有美国比较文学家的共同观点。而我们认为，提倡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是正确的，但是不可以扩展到大而无当、漫无边际的地步。文学是一个广大的领域，在文学研究中，有许多因时代、地域、形式、内容、角度、关系、方法论基础……等条件而自成体系的学科划分，而其中任何一门单独的学科都必须有自身的相对的课题，对象和领域，学科本身作为一种概念，必须有它本身明确的外延和内涵，如果无限扩展，到最后势必使这一学科的特殊性消失，使这门学科化为乌有。比较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它研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文学的联系与异同，以及文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与异同，并由此寻求世界总体文学的共同规律性，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文学研究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不是如美国同行们所说，一切文学研究都是比较文学研究，这种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只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正常进行带来妨碍。有趣的是，当年法国学者因忽视文学特征而走向取消比较文学，如今美国学者又因用“文学”取代“比较文学”而走向取消“比较文学”了。

以美国学派贡献为主的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的另一不足，是纯理论的探讨多，而实际的联系与异同的对比研究少。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界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有些近乎玄虚，过于抽象，体系性不够，说服力不强，往往出现一些“方法论游戏”的状况。从当今西方世界学术思想界的情况看，这种状况是资产阶级文化混乱状态在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一种反映。

第二阶段的另一个缺点实际上是第一阶段“欧洲中心论”的延续。美国学者对法国学者仅仅以欧洲史料为依据来研究比较文学表示不满，指出这是“欧洲中心论”，他们也的确不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然而我们感到，美国学者，一般说来，对东方世界的文学仍然是忽略的。“欧洲中心论”固然是行不通，“西方中心论”也必然是行不通的。两者之间仅仅是小巫与大巫之别而已。

所有这些情况，使得西方比较文学研究面临新的危机。

三

如果说在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中，法国派过于务实，在第二阶段中，美国派又过于务虚；第一阶段中法国派忽略文学特征，第二阶段中美国派又走向因一般文学特征而使比较文学本身特征消失的另一极端，那么，发展到现在，似乎应该有一个由正而反、而合的新阶段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向前发展，而时到如今，再以原有的一套观点方法和“西方中心论”来求发展是不行了。西方比较文学界要想渡过他们面临的危机，把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一级的阶段，必须着眼于全世界的文学，

必须不再忽略东方，同时，也必须克服他们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才有可能。

这种趋势目前在西方已经出现。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他们的视点移向东方。引用一句六十年代日本《比较文学》杂志上的话来证明：“在法国现有的教授席上，比较文学的实践是充分多样化的。它正在开拓新的视野，斯拉夫国家和东方国家开始吸引研究者。如果我们不是对这种多样化感到庆幸，如果我们力图斥责到处在尝试着的新方法缺少正统的话，我们对比较文学也就极少有信任可言了。”这里是说欧洲和法国，其实在美国也有变化，七十年代以来，许多知名学者，如白芝教授，刘若愚教授，叶维廉教授等人，都在东西方文学的对比研究中作出贡献。香港中文大学的比较文学专家们以及中国台湾的学者，也利用他们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界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在许多方面推动和促进着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特别举出法国当代比较文学界的第一流学者雷内·艾金伯勒的观点来说明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变化。艾金伯勒作为法国比较文学界的权威人士，对法国学派的一系列陈旧的正统观念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在许多方面接受了美国派的观点，比如强调文学特征，主张比较文学应该为寻求世界文学的规律而努力等等。但是，他的理论与实践又往往超越了美国学者的某些局限性，他以自己深厚的东方文学知识和研究成果为依据，有力地驳斥过“西方中心论”，他的一系列专著（尤其是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作对比研究的著作）皆以多实证而少空论为人称道。他在赞成平行研究的同时，并不排斥影响研究，以为二者应该兼顾。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头。首先，现状是难以轻易动摇的，比如，对于艾金伯勒这种有改革精神和前进精神的观点，正统的美国派学者，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便讥讽为“造反”，说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同时，这些表现出新趋向的学者本身也仅仅是表现了一种“趋向”而已，他们的态度是软弱的，就拿艾金伯勒来说，他的观点中对西方前二阶段观点的发展少，对二者的调和则居多，而在一些比较文学的关键问题上显得犹豫，他“渴望能在美国观念与法国观念之间保持平衡”。而“保持平衡”并不是一种要求进取的立场。

恰当此时，苏联学者介入了。苏联在世界学术与文化中的位置是居于东西方之间，它的介入应该有利于这种使西方向东方的转变，苏联学术界有列宁主义的多年熏陶，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我们对苏联学者曾寄予厚重的希望。但是，就目前而言，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苏联比较文学研究在革命初期有过一度的发展，到四十年代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倾向对文学研究的干扰，比较文学在苏联被视为“反动”学科而遭禁，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逐渐恢复。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召开了

名为“各民族文学的联系与影响”的比较文学讨论会，一九六二年在布达佩斯召开苏联东欧集团的比较文学讨论会，一九七一年在莫斯科召开“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从此比较文学研究在苏联和东欧重新得到承认。苏联东欧学者的重新介入，作为世界一片广大地域的代表，引起广泛的重视，而且他们又是以美国学派的批判者面目出现的，对于显示西方比较文学发展第二阶段主力军的美国学派的某些缺点起了作用。我们希望，他们的工作会成为世界比较文学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推动力。遗憾的是有些苏联学者的论著和发言中往往用政治概念来取代学术概念，为一时间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客观的学术真理。他们对美国学者的批评中，有许多不能说服人的东西，在理论上也缺乏新鲜感。虽然苏联学者六十年代以后在世界比较文学论坛上的复出，的确为新局面的展开作了一些贡献，但是我们认为苏联学者的理论与实践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一种有自己特色和体系的学派，更不能说它是标志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的阶段。就苏联学者的师承关系来看，被尊为苏联比较文学之父的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的主要观点实际上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的观点无本质差别，他的学术活动主要仍限于文学的流传、借用与影响的研究。苏联学者从他的理论出发，至今没有能够超出影响与联系研究的窠臼。至于近年来苏联学者所提出的“类型学”研究，也是西方学者有过的提法，并往往与美国学者的平行比较区别不大，似缺乏创新。苏联学者能够注意对过去两大阶段的观点择优而取，兼容并包，这是好的，但是从一种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质的特色和实践上质的贡献的要求来看，苏联比较文学研究还不能说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学派”，也不能取代西方而代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总之，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过去有很大贡献，而今后尽管仍能作出贡献，却很难再居于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的和领衔的地位了。它必须与东方相结合，并且在观点与方法上作彻底的革新，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而东方国家，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国指导思想的中国，必将在未来的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起重要作用。

四

比较文学是一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把比较的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而且是运用于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这在中国早有出现。因此我国许多文章中列举了不止一件的春秋、汉魏、明清的例子，用以说明这种学问原本也是一门中国的学问。其实我觉得，何必在每一个外来事物被我们引进的时候，都来一个“古已有之”呢？接受外来影响是历史的必然，

是进步的途径，也是民族气魄的表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欧洲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的。我们虽然先有了一些自己的比较文学性质的研究，但是后来才从西方引进了这一学科概念，这是不必否认的事实。中国近代史在许多方面都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说是一部外国事物进入中国并被接受的历史。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梁启超、严复等人所做的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工作中，包含许多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分，林纾的翻译工作是典型的比较文学工作，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研究》，苏曼殊的诗歌翻译与评论从比较文学的要求看，更是当之无愧。鲁迅写于一九〇七年的《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中，既有“影响研究”，也有大量的后来提出的“平行研究”，二十年代又有茅盾、周作人、郑振铎、耿济之等人有关中英、中法、中俄文学的比较研究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这时，从全世界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而我们的比较文学则还是一种大势所趋、自然而然的现象，仍不能说“比较文学”学科的正式出现。直到“五四”前后，民主与科学浪潮冲刷着我们身上的历史积垢，无数新的概念涌入中国，其中也有“比较文学”这四个字。据贾植芳的考证，最早是在一九一九年章锡琛于《新中国》杂志译介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文学研究法》一书中出现的。接下去，一些目光远大的前辈学者都在这方面做出有意义的和比较自觉的贡献。三十年代，傅东华与戴望舒译出了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和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二书，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标志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正式的开始。这以后，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梁宗岱、闻一多、朱光潜、钱钟书等人便以不可阻挡之势，雄浑有力地开拓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事业，出现许多可喜的成果。其中梁宗岱的《诗与真》，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都是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比较文学著作。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本来应该是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繁荣的时期，遗憾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使我们全盘接受了当时苏联的观点，其中包括“比较文学是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反动学科”的观点。后来的十年浩劫中凡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都面临“横扫”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当时从外表看已临于万劫不复之地。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号召下，这门学科才被称之为“新兴学科”，重新作为“婴儿”诞生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目前已经是一个震动世界比较文学界的重大事件。其实中国学者又何曾中止过他们的工作。最好的证明是钱钟书的《管锥编》这部巨著，它恰恰是在“四人帮”统治的那黑暗的十年中间写成的。

纵观中国从本世纪初到现在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成绩与特点。

① 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结果一般都是较为实事求是的成绩，空泛

的议论少，切实的作为多，可以说并无哗众取宠之心。他们从大量的丰富而有说服力的中西文学史料和事实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归纳，为世界文学的总体规律性的探讨提供了大量可信服的根据。从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开始，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到闻一多、朱光潜、钱钟书、杨宪益诸人的著作，莫不如此。鲁迅的两篇名文虽是他早期著作，其中借用国外研究成果者居多，属于启蒙性、介绍性作品，但是其学风是严谨的，他列举大量东西方古代文学以及英美俄法诸国文学的事实，怀着唤醒中华民族的目的，令人信服地把我国文学研究界的眼光，引入了广大的世界范围。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半个多世纪以后，钱钟书又以其辉煌的成就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力。钱钟书一贯反对空论，“他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实际问题毫无补益”（见张隆溪记与钱钟书谈话的文章）。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以闻一多、朱光潜、钱钟书等人的贡献为代表的中国数十年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仅从实际出发，不作空论，而且从来是紧扣文学的。钱钟书一再强调要戒“别求诗外之物”，主张“谈艺”，要追寻“艺之本源”，重视“诗心”、“文心”。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也从来是以文学为本体，以探求文学规律为宗旨进行研究的，季羨林五十年代的名作《印度文学与中国》一文的风貌也恰是如此。在这样的前辈风范导引之下，中国比较文学界后来出现的一些优秀之作，如王佐良的《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都是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这种优良学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兼容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史上法国学派的务实精神和美国学派的重视文学特点的态度，表现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的品格。

②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具有世界文学的整体意识，并且中国学者在充分重视西方文学传统的同时，着重于立足东方文学实际，他们不仅从东方数千年的文学典籍中整理出无数宝贵的可比性材料，而且把它们与西方文学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能沟通中西，又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当年法国学者只看见法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美国学者也相对地更多着眼于西方。然而没有东方文学的参加，是不可能作出认真的有价值的世界比较文学的结论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一再强调指出“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占有的独特地位”（季羨林），不研究东方，不沟通中西则不可能有世界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回顾鲁迅的《说》与《论》，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尤其是钱钟书的《谈艺录》与《管锥编》等，无不以极其雄厚的东方及中国文学事实与西方文学事实作联系对比的杰出成果。到八十年代，中国学者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除上文提到的王元化、王佐良等人的成就外，

如张隆溪、赵毅衡等人的比较文学成果，也都具有立足东方、放眼世界、沟通中西，探讨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是超越了历史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局限而“更上一层楼”的。

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一般立论较公允，观点较全面。中国学者虚实并重，立足于实地而又注意寻求一般性规律，重平行研究而又不忽视影响研究，并能够注意到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间的内在联系。早在“五四”以前出现的中国的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论著中，已经表现出这些特点来，比如鲁迅的《说》与《论》，便能够根据大量印度、希伯莱、伊朗、埃及、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文学的事实，寻求其间的联系，又能从中概括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世界浪漫派诗歌的本质特征。钱钟书的《管锥编》中主要是平行研究，然而，书中有关影响研究的一些观点，如反对“强瓜皮以搭李皮”等等，都是重要的观点，他指出了影响只可能出现在本质上以及文化背景上有其联系性和共同性的现象之间。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虚实之争，“平行”与“影响”之争，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而中国学者却长久以来在自己的埋头工作中实际已经说清了许多问题。我觉得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本上也是体现了这样的文风的。

④ 中国学者不仅学风严谨，实事求是，能够东西兼顾、虚实并重，而且，在文章风格与治学特点上，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广采众家，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气度；闻一多集文学家与史学家、诗人与理论家于一身的文采；朱光潜绵密细致、侃侃而谈、学贯中西的风貌，都给我国读者和国外学术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健在的钱钟书的比较文学论著，更是体现了中国学者和东方学者的治学特色，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推崇。钱钟书以中国雄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史哲遗产作为自己的立足基地，毫不犹豫地以研究中国典籍为纲，广征博引，纤毫不遗，用无数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每一个观点。他的论著中，也有大量西方文论材料，但他决不让这些材料去“喧宾夺主”，而只是用来作为他从中国书中得出的结论的佐证，并且往往都是放在一个段落最后。西方材料在钱钟书手中往往是顺手拈来，为我所用的。钱钟书的文章貌似无体系实则对自己对一些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看法。比如，在《谈艺录补订·150页》一节中，他在发挥文学中的描写往往高于现实，美于现实的观点时，在引证《老残游记》等一系列中国例证后又举出达文齐（达芬奇）的一句话：“镜中所映画图似较镜外所见为佳，何以故？”接着便言简意赅地写了一句：“窃谓斯语足使谈艺持《反映论》者之参悟也。”这是对那些把《反映论》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作法的含蓄批评。他的独特的推理与论证以及对文章的词章、义理等等所作的自己的阐述与分析，不言而喻，说服力极强，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并且，钱钟书的比较文学论著一般都是糅鉴赏、评价与议论于一体，在《谈艺录》

的序言中，钱钟书自己便把这部比较文学名著称之为“赏析之作也”。在这些文章中，既有作者自己的艺术感受，也有他深思熟虑的结论。读来亲切诱人，发人深省。从钱钟书的比较文学论著中我们感到，正是我国深厚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孕育了他这样的典型中国式的学者和文风，他的治学特点是集中并融合了诸如《文赋》、《诗品》、《文心雕龙》以及唐宋以来我国的诗话、词话、曲话和小说评点的文艺批评方法特点而形成的。

总的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从本世纪初期到现在，成绩是巨大的，其中尤其是那些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足以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启发。因为我们知道，研究方法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核心和灵魂。同时，作为东方大国，在西方比较文学界正认识到自己过去搞“西方中心论”的缺点而力图扭转，面向东方的时候，我们正可以带着我们的成绩特色积极投入，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尽管解放以来因政治原因沉默了几十年，但是在今天的开放政策下，我们的前途是十分光辉的。

我们这本书，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发起编写的。

自七十年代末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复兴”以来，不断有好的文章出现，文学界人士相继把注意力转向这门学科。怎样把一个时期以来的成果总结一下，保存下来，怎样能够调动更多同志的积极性，使比较文学的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想到了编这本书的计划。起初，我们低估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当近千篇稿件从全国各地涌来时，我们才逐渐有了认识，当然，也受到这些各方面的作者创造热情的鼓舞。经过四年的努力，由十多位同志共同配合，最后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同志花了一番不小的力气，才总算完成了这本一百余万字的书。不免遗憾的是，为了保持大家所期望的水平，相当多的文章在一次次编辑和审稿过程中被割爱了。但是我们仍然要感谢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我们的热情支持。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如徐中玉先生、贾植芳先生、钱谷融先生、朱雯先生、余振先生，都曾关心过这本书的编写。上海师范大学王秋荣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徐大兰同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王璞同志、刘文荣同志，夜大学八七届毕业生王力明同志 and 外国文学助教进修班的范明学、郭君、赵秀敏、丁武军、邓庆生、梁章林、倪宗豪、李健、李明敏等同志也为这本书出过力。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为本书的主编，我还愿意借此机会代表全体作者和编委向阅读和使用这本书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因为只有您的阅读和使用中，才能体现出我们这项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来。而且，通过您的阅读和使用，定能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种种缺点。我想，您是不会吝惜把您的宝贵意见告诉我们的。

一九八八年元旦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